

十五大以后·

中国社会热点

新的彼岸

走向21世纪的中国民主

王仲田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蔡雨龙

封面设计:赵 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五大以后中国社会热点/中共中央党校政治学法学教研部组织编写.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3

ISBN 7-5035-1684-4

I. 十… II. 中… III. 社会问题-研究-中国 IV.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990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0

字数:1200千字 印数:1—5000册

ISBN 7-5035-1684-4/D·731

定价:(全六册) 96.00元

前 言

走向 21 世纪,人类社会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也将面临许多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和热点问题。

民主化是历史的潮流,也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因此,一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必然面临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课题。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也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因此,中国的民主化就自然成为走向 21 世纪中国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规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表明,民主化已被列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日程,成为中国跨世界发展的历史课题,即中国走向 21 世纪的日程,同时也表明,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历史的潮流。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中国的民主化问题仍然

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主要问题是:(1)中国的经济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条件,是民主政治,还是集权政治,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应包括政治的民主化;(2)中国的民主政治模式应该是什么,是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还是走中国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3)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如何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现有的政治体制如何改革、完善,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事关每个公民的权益和发展,事关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事关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命运。因此,每个理智的中国人,不能不关心和思考中国的民主化问题。

本书的基本思路就是: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必要性,分析中国民主建设的战略目标、现实条件,研究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结构和运行模式,揭示中国民主进一步发展,走向新的彼岸的基本途径。显然,这些都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

民主化问题,总的说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发展问题。与专制政治相比,民主政治显然是更高级的政治形态,是更科学、更精致、更文明、更复杂的政治制度设置。中国的民主化问题,由于公民数量的宏大、社会结构的复杂、经济文化条件的落后等原因,必然是更复杂的政治问题,其任务之艰巨、道路之曲折,恐怕为世界所罕见。因此,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性课题,它需要全民族的智慧和亿万人民的共同努力,远非一两本小书

可以解决。不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笔者的心愿只在于，通过这本小书，参与到中国民主化问题的探索之中，同时求教于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为中国的民主建设作出共同努力。笔者也坚信，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已经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循着正确方向，不断努力，不断进取，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一定会走向新的彼岸，赢得光明的前途。

作者

1998年1月

目 录

前 言	(1)
一、历史的选择：中国必须走向民主	(1)
(一) 从封建专制到近代民主	(1)
(二) “民主新路”的探索	(20)
(三)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曲折发展	(29)
(四) 民主建设的历史教训与现实难题	(37)
二、民主与跨世纪的宏伟目标	(44)
(一) 树立发展民主的战略意识	(44)
(二) 民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47)
(三) 实事求是地确定民主的发展目标	(58)
三、促进与制约：民主的基本条件	(65)
(一) 民主的主体结构	(66)
(二) 民主的理论基础和文化观念	(74)
(三) 民主的物质基础	(82)
四、原则与体系：民主制度运作的内在逻辑	(86)
(一) 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	(86)
(二) 民主制度的体系结构	(115)
五、民主建设的基础结构：健全公民民主权利体系	(151)
(一) 公民民主权利的基本体系	(152)
(二) 中国公民的民主权利体系	(165)
六、民主建设的硬件构造：完善制度结构	(179)
(一) 完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179)
(二) 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6)

(三) 扩大社会团体的民主参与	(216)
(四) 推动群众自治和基层民主	(225)
(五) 健全民主政治的法律体系	(239)
七、民主制度的运行模式	(248)
(一) 民主制度的一般模式	(249)
(二) 中国民主制度的模式特征	(257)
八、奔向高度民主：中国民主发展之路	(272)
(一) 立足基本国情	(272)
(二) 坚持正确方针	(281)
(三) 选择现实途径	(292)
结语：并非十分遥远的前景	(298)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和书目	(301)

一、历史的选择：中国必须走向民主

追求民主，是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潮流。从封建专制的腐朽统治到民主变革的开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探索；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立到社会主义民主的曲折发展；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虽然几经挫折，多有劫难，但中国必须走向民主，却始终是无数革命先驱、志士仁人和进步党派执著的追求，是中国百年历史作出的明确选择。

（一）从封建专制到近代民主

民主政治是君主专制的对立物，它的兴起和发展，自然当以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和革命为前提。中国近代以来对民主的追求，也是起始于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变革。

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王

朝到清朝末年，历时二千多年。它曾给中国带来过统一、强大和繁荣，也给中国带来过分裂、混乱、贫穷、落后和无穷的灾难。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走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重大障碍。

封建专制制度究竟是何物？它的弊端何在？为什么在历史的发展中它必然要为民主政治所取代？这是研究近代中国民主运动兴起和民主进程的首要问题。

所谓封建专制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以封建君主一人为国家主人，由封建君主一人拥有并行使所有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1) 皇帝高度集权。在清朝末年，国家的军事指挥权、政治决定权、官吏选拔权、财政税收权和司法终审权等国家最重要的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国家虽然设有军事、政务、人事、财政、司法等部门和地方政权机关，但这些部门和机关的行政长官，对自己所管辖的事务，均无最终决定权，一切重大事务，均由皇帝“钦裁”。正如历史学家顾炎武先生所云：“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

之守，皆人主自为之”。^① 这样，皇帝既掌握军权、政权、财权、人事权，又掌握每个人的生死予夺之权，成为拥有绝对权力、至高无上的太上皇。与此相反，广大平民百姓则无任何权利可言。他们不仅没有任何参与国事的权利，也没有结社权和言论自由权，甚至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严格限制。如清律明确禁止结社、订盟，以防“朋党作乱”。至于言论自由，不仅百姓无权议论国事，就是王公贵族、大臣官吏，稍有出言不慎，引起圣怒，则必遭横祸，甚至株连九族。

(2) 暴力统治。在清朝，暴力统治主要表现在统治者对人民反抗进行严厉的镇压和刑罚。清律沿用隋唐以来法典中的传统规定，把人民反对封建统治的行为称为“十恶”，而且认为“其恶已极，其罪至大”，“法不容宽”，一律处以极刑。凡谋反的不分首从，一律凌迟处死，并株连其父子、祖孙、兄弟及同族的人。为了防止人民群众利用宗教聚众反抗，清律规定“倡立邪教、传徒、惑众、滋事”行为为谋反，甚至连异姓订盟结拜兄弟也要照谋反判

^① 周谷城：《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第204页。

罪。此外，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的斩立决，随同的绞监候（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等候秋审、朝审复核），被胁同行的，各杖一百。至于喧闹公堂、侵犯帝室、私藏火药、持械拒捕等行为都要处以重刑。清律还规定了一套严酷的刑罚制度，主要有：迁徙（移乡千里之外），充军（比流刑更重的单独刑罚）、发遣（即将罪犯发往边疆地区种地、当苦差，为驻防官兵当奴隶）和死刑。其中死刑范围不断扩大，到同治年间清律中，有关斩、绞的律例 700 多条，适用于斩、绞的罪名达千种以上，而斩、绞的手段之残暴，令人目不忍睹。

（3）人治管理。这是指国家的治理主要不是依靠法律制度，而是依靠统治者的主观意志，最主要的是皇帝的意志。皇帝的意愿、爱好就是国家的意志，皇帝的圣旨可以创造法律、代替法律，也可以废除法律。总之，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一切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以当政者的好恶为依归，人正则政兴，人误则政衰，人亡则政息。与此同时，改朝换代，朝令夕改，纲纪多变，因人而异，管理无序，冤狱遍地也就成为政治运行的基本特征。

以皇帝集权、暴力统治和人治管理为主要特征的中

国封建专制制度，到了清朝末年走向了极端，也暴露出严重的弊端，产生了诸多社会恶果，使得民主政治取而代之成为历史的必然。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及其恶果主要表现可列举如下：

(1) 君民隔离，国家日益脱离社会。皇帝高高在上，拥有一切国家权力，而平民百姓则身居社会最底层，只有受苦受难的义务，而无任何权利可言，君民之间如天地之隔，君在天堂，民居地狱，君不知民间疾苦，民无法求助君主的帮助。与此同时，国家日益脱离社会，失去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成为皇帝一人专权的工具，平民社会的利益与国家日益脱节，使国家的统治日益失去社会的支持，君主统治的社会基础发生动摇。

(2) 君民对立，政治统治陷入危机。封建君主由于实行一人独裁统治，所以，不得不用极为残酷的暴力手段镇压人民的不满和反抗。这样，君民之间始终处于对立的地位和对抗的关系，官逼民反，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使得国无宁日，社会动荡不安，封建统治者常常陷入政治危机，有时甚至被农民起义所推翻。

(3) 长官意志盛行，管理混乱无序。君主专制的人治管理方式，必然导致长官意志为主，主观随意性盛行。上至皇帝，下到普通官吏，重人不重理，重言不重法。这样，个人的主观随意性和思想的局限性，就必然带来国家管理中的决策失误、政策多变、组织无序、执行混乱，最后，漏洞百出，冤狱遍地，遗害社会，祸及子孙。

(4) 等级森严，禁锢自由。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从平民到贵族和皇帝，等级分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同社会职业、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往往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相互之间的流动和思想感情的交流，也十分困难。至于个人的自由则受到严格的限制，平民百姓不仅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结社自由和政治参与自由，除了皇帝一人享有绝对自由外，连封建贵族和官吏，也没有言论和结社自由，对于文人墨客也是大兴文字狱，稍有疏漏，就会带来杀身之祸。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和对自由的禁锢，实际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创造自由和平等竞争，从而在根本上扼杀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5) 封建迷信和个人崇拜盛行，科学冷落，人才毁灭。由于封建专制统治是皇帝一人对全社会的集权统治，所

以，为了维持这种统治，统治者除了用武力镇压社会的反抗，就必须依靠封建迷信，编造各种神话，欺骗愚弄百姓，为自己的统治披上神圣的、合法的外衣。在这种条件下，个人崇拜达到极点，皇帝被奉为天子和救世主，百姓是受苦受难的愚民，百姓只有忍受现实、承认自己的命运，等待天子的拯救，不需要有别的作为。与此同时，科学由于不承认迷信被视为邪端异说，先进的技术和发明创造，也被视为怪物。而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才也往往遭到冷落，甚至由于违背统治者的主观意志而遭受打击、迫害。于是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在野蛮落后的封建专制的铁蹄下被践踏和毁灭。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弊端和恶果表明，在它走向末日的时候，它已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阻碍历史前进的严重障碍。在这种制度下，自由被禁锢，创造被限制，科学被冷落，人才被毁灭，百姓受压迫，人性被压抑，君民对立，民心涣散，国无宁日，危机四起。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几乎全被扼杀，国家强盛的一切积极因素几乎全被毁灭，社会成为腐烂发臭的一潭死水，国家成为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因此，变革封建专制制度已成为近代中国

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1840 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给腐朽没落的封建帝国以沉重打击。一方面战争的失败，使全体中国人蒙受了极大的耻辱，连至高无上的皇帝在割地赔款的投降书上签字后，深感丢尽了老祖宗的脸，面对列祖列宗，痛哭流涕；另一方面，战争的失败也彻底暴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没落，许多有识之士在痛感耻辱之余开始猛省，他们看到了二千多年的文明古国开始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开始认真的思索民族危机的根源和摆脱民族危机的根本途径，痛感变革现实的必要。当 1856—1860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后，变革图强、振兴民族的呼声更为强烈。于是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振兴民族、富国强兵的历史潮流。这股潮流的先导是张之洞等人倡导的“洋务运动”。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他们认为中国图强的当务之急是学习西方的技艺，实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方略，并提出实行以建设新式军队、引进机器生产和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自强新政”，时称“洋务”。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也在更广泛的领域思考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和

民族振兴的道路。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就有人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除了生产技术之外，还有“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即中国在政治、思想方面也落后于西方。正是在人们面对民族危机，全面思考和探索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之路的历史潮流中，也开始了近代中国批判封建专制、追求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

近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主要是指旧民主主义运动，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这一运动虽然艰难曲折、变化多端，但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和发展，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留下了有价值的遗产。

近代中国批判和变革封建专制制度，追求民主政治的历史斗争，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末。这是民主思想的启蒙和传播阶段。其基本特点是，了解和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民主观念和民主活动，并以君主立宪制为参照，提出改革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些构想。

19 世纪 70 年代，由于外国列强的不断入侵和农民起义的打击，国内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一些有识之士更加感